

July 2021

##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Zidong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Zidong. 2021.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1, (4): pp.150-15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1/iss4/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许子东

---

**摘要:**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和农民,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主题。但是在晚清和当代小说中,官员形象是第三个重要的人物系列。知识分子与农民及官员形象之间,在小说中常常呈现某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如果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启蒙救亡”,那么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之间的“互相改造”过程,以及农民与官场“矛盾依存”关系的演变,也都需要分别梳理。

**关键词:** 农民形象; 知识分子形象; 官员形象; 启蒙救亡; 互相改造; 矛盾依存

**作者简介:** 许子东,文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通讯地址:香港新界屯门青山公路八号岭南大学中文系。电子邮箱: zidong54@gmail.com。

---

**Title:**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Abstract:**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s central to the literary theme of “re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Howe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s, officials become the third important image of characters. The complicated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peasants and officials in fictions is since formed.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peasa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process of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official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sants and officialdom also need to be described separately on their own terms.

**Keywords:** the image of peasants; the image of intellectuals; the image of officials;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mutual transformation; contradic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Author:** Xu Zidong, Ph. D.,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and Zijiang Chai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8 Castle Peak Road, Tuen Mu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Email: zidongxu@ln.edu.hk

---

## 一、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形象

这基本上是学界的共识: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他们的合作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

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7)但是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从胡适、鲁迅读起,还是从梁启超、李伯元读起,有很大分别。在 20 世纪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并不是“士农工商”,而是各种各样的

官员。官员形象虽然在“五四”以后的小说中被有意忽视,但是到当代小说中又成为重要人物系列。所以,本文认为,有必要考察官员/官场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发展变化(官员、官场、干部,在本文中均为中性概念)。

李伯元对晚清“官本位”现象的无差别批判,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解析无官不贪的人性原因——贪腐是刚需。清朝后期半数官员是捐的,捐官投资,官员家庭开销,以及向上级送礼(“政治保险金”),合起来超过官俸部分,必须靠实缺贪腐。这几乎是经济学原理。第二,普遍贪腐必然导致教育、经贸、军事、吏治,还有救灾、慈善、外交等等官场全方位失职。而且从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的中堂,层层贪腐层层保护,反正“佛爷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来的清官”。清廷非常体谅,现实当中的慈禧也没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说家,反而把小说当作官场反贪的线索。<sup>①</sup>《官场现形记》人物太多,没有突出的文学典型。但其作为群象刻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是后人所不及的。“五四”以后,人们以为“官本位”现象一去不复返,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官制度,历史悠久,也可能来日方长。中国小说家在100年前就已看到,后来国人忙于追求革命或现代性,居然没有足够重视。

第三个层次,晚清小说认为贪腐之可恶,不仅在于社会成本太高,或者延误军机政事,更在于官员道德堕落、违反儒家伦理(最触目惊心的底线,是官员将女儿送给上司做妾)。文学始终是人学,但晚清重视“人伦”,五四最关心“人生”<sup>②</sup>,延安以后强调“人民”,80年代重新回到“人生”。第四个层次,李伯元等人的写作动机,是真心认为中国病了,病因就在官场。官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场,正是拯救国家的关键。

晚清四大名著,还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主要人物都是官员,差别只是李伯元冷嘲,吴趼人热讽。《孽海花》男主角身兼官员和读书人,艺术价值最高的《老残游记》,关于官场的立论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贪官更坏。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有一个“互相改造”的过程。在晚清阶段(只有在晚清阶段),知识分子自以为拥有巨大精神优势,或如梁启超在体制外设计国家前途(还极

为精准),或如李伯元写小说把官员当学生教训。这些晚清小说中的官员主角,到“五四”新文学,几乎忽然全部消失——这是一个学界似乎还很少讨论的文学现象。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中间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小说,极少以官员为主要人物。仅有的少数例外或有1938年的《华威先生》,以及茅盾早期中篇《动摇》等。

为什么晚清作家认为官员/官场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到了五四文学官员/官场却好像被突然忽视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中国作家生态变化、民国出版审查制度、社会政治思潮变化,以及现代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的课题。

第一,鲁迅说过,“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鲁迅,第三卷554)。在军阀和国府管制下,文学要在报刊审查制度及警察暴力下批判官员(民国后改称“干部”),比在租界嘲讽晚清官员难度更大。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党”等等政局变化,让人们看到即使旧官场被打倒,新官上任也未见得会变好。所以关键并不在官员和官场。“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刘鹗那样有信心教育官员,也不再只将官民对立视为中国危机的关键。鲁迅看到,在传统礼教和社会秩序下,官员和民众都有被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两重性。“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鲁迅,第一卷224—227)因此,“五四”文学的批判重点就不仅是官,也不仅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国民劣根性。“五四”文学的确主要写知识分子和农民,但是往前上溯到晚清,往后延伸到50年代,我们就会看见官员这条人物主线,只是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

第三,民国文学中“官场”貌似缺席,其实是隐避,而不是真正消失。魏连受做了将军的秘书,显示“孤独者”的尴尬处境。“狂人”最后病愈候补实缺,做官等于失败堕落。茅盾的《动摇》详细记录了北伐前后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如何选举、怎样恋爱,也是早期民国官场一角。官府依旧迫害民众,只是作家不让高官直接出场。只有鸳鸯蝴

蝶派小说如《啼笑因缘》《秋海棠》才会直写军阀作恶。“五四”小说更注重渲染官场的帮凶爪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药》里的康大叔,比如《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

官员(干部)形象再次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角,是在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里。主人公名义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诸葛,但是对剧情起关键作用的是村武委会主任兴旺、村镇委员金旺、妇救会主任金旺老婆,当然,最关键的还有区长(也是赵树理小说与故事原型的最大不同)。

《小二黑结婚》重新出现了传统审美的“善恶对立”的格局,但不只是晚清的贪官欺压民众,还有好官为民做主。官分善良邪恶,民分先进落后,从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小说里一直贯穿着这种人物四分法——既要改变晚清的“官—民对立”情节模式,又要延续民间文艺的“忠—奸对立”审美习惯,区别好官坏官,依据国共或者路线,划分群众的标准,依据年龄或财产。这个时期的官员/干部形象,内心(格物、致知、修身)和工作(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矛盾。《红旗谱》中地下党教师贾湘农一心革命,发动农民造反。地主冯老兰儿子认识国军司令,镇压学运。《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心胸高洁,为民众谋解放;反派徐鹏飞、严醉等,态度虚伪,手段毒辣。《红日》里的沈振新军长有将军风度,只有张灵甫稍微复杂一点,脸谱化中有点变化。

黑白分明、善恶对立既是战争文化需要也是通俗文学规则。《林海雪原》里,国军残余土匪相,203首长像王子。《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前后两任地下党男友既是战士又是君子。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英俊正气。舞台剧中则是年轻美丽的女性吴琼花、韩英、江姐等,被丑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鹏飞等审问迫害。性别斗争悄悄融入革命题材。

从文学角度看,晚清小说中的“官员”形象,除了状元官金雯青与行医文侠老残,一般共性多、个性少。五四文学“官场”虽被忽略,魏连殳、华威先生的性格还是充满了矛盾或戏剧性。50年代文学的主人公,比较知名、比较感人(也比较有文学意义)的形象,大都是已有“干部”之心,尚无“官员”之位(如许云峰、江姐、卢嘉川等)。“干部”和“官员”这两个概念重新发生联系,是在50

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两者的大规模被混淆,则是在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通俗文学中。

晚清写官是无差别批判,五四写官是有差别忽略,“十七年”写官是黑白分明,第四个阶段,更准确地说是70年代末开始,官员形象不仅重新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中心舞台,而且至少分化成五个类型。

第一类是许云峰、江姐等英雄形象在新时期的延伸,内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于社会。比如乔厂长,《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军,《芙蓉镇》里的谷燕山,都胸怀坦荡,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组织部的林震是这类形象的先锋。

毛泽东早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看到了官僚主义,指出了“干部”与“官员”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sup>③</sup>乔厂长、田福军因为身处改革开放时代,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支持。比起许云峰这种一代英雄,他们也可以有些小缺点,比如乔厂长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师结婚,比如田福军开会以前要抠脚,谷燕山在战争当中被打成性无能等等。小缺点是为了纠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仔细想想,张承志歌颂的几代哲合忍耶教主,好像也都是内心善良、行为高尚的“领导”。

第二类,就是负面的官员形象——徐鹏飞、张灵甫及金旺、兴旺的继承人。这些人内心丑恶,行为害民,至少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如韩常新)。这类人物在“新时期”文学中相当丰富。《芙蓉镇》里的李国香因为性心理不平衡,才要在政治运动当中出风头。《古船》里的赵多多与赵四爷,一个粗野,一个文雅,都是贫苦出身,最后变成新恶霸——赵四爷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典型。《平凡的世界》里有几位在“文革”后期积极打击农民村“资本主义”的干部,有的随形势转向,有的一直有问题,不是睡寡妇,就是搞权斗。在新的路线斗争格局下,他们属于反改革的反派人物。《平凡的世界》当然主要写农民,但与农民对话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各级干部——在大部分现当代小说中,“民”与“官”之间(之外),总有一个“士”的角色与角度,比如路见不平的老残,目睹闰土、祥林嫂的“我”,听福贵讲如何“活着”的文青。只有《平凡的世界》(及《官场现形记》)例外,没有出现“士见官欺民”的现代小说常见模

式(这也是士、民、官三种形象的最基本组合关系)。或者是路遥、李伯元隐身在作品中,让民众自己面对官员或干部。这两部被人低估的作品比较能体现中国国情:百姓受难时,哪里总有(哪里需要)读书人在一旁目睹同情?

第三类官员是 80 年代文学的新品种,在五四、延安时期和“十七年”都没出现过,却成为 20 世纪晚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干部/官员形象。通俗讲就是“好人做坏事”,分明是好官,却坏了老百姓的事情。

李顺大辛苦积累盖房材料,结果被“大跃进”折腾没了。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最后硬是把国家应有的赔偿给劝没了,劝得李顺大还流泪感动。另外一个吴书记,看到农民陈奂生躺在车站,身体不舒服,好心叫车把他送进县委招待所,没想到一晚上住宿费五块钱,把陈奂生进城卖农副产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刘清同志、吴书记在高晓声笔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害了农民。

更典型的案例,当然是余华的《活着》。农民土地入社,忙于煮钢铁,然后大饥荒等等,都是听从队长的指挥的结果。农民都相信队长,队长是好人,可是好人领导大家走向了灾难。县长夫人生病,福贵儿子抽血死了。偏偏县长春生和福贵原是国军战友,又是好人办了坏事。只能流泪,不能问责,只写细节,不论背景。这种好心却做坏事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 年代共产党员鹿兆鹏就鼓动农民运动,结果砸了祠堂毁了乡约……

阎连科《受活》里的茅枝婆是好干部的最后一个人物。一个老红军,几十年来领了一村的残疾人入社、炼铁、度荒年、经“文革”。茅枝婆革命道德绝对高尚,可是她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庄的乡亲,最后她非常后悔。

第四类官员形象是“官僚主义者”,是一种从理想朝气渐渐变成世故犬儒的干部。最典型的当然是 50 年代的刘世吾,他年轻时可能也是一个林震,经历多年“官场”,百般锤炼,成熟了,有涵养了,也变得世故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这种官僚化(干部变成官员)的过程到底是中国特例还是普世规律——王蒙提出的问题,在中篇《蝴蝶》里,还有韦君宜的长篇《洗礼》里,都

有更细致的探讨。总体上,作家相信经过“文革”洗礼、忘了初心的干部,能够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为好战士、好官员。同时,中国作家也愿意想象或期待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如果某官员爱读书,尤其是爱读文学书(特别是《静静的顿河》《契诃夫全集》之类),通常内心里(或曾经)是个好官。这种一厢情愿的官场想象,至少是从《孽海花》开始的。

第五类官员形象特别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他们在人格道德上都有明显缺陷,却能在客观上为民众办实事。比如《受活》里的柳县长,追求个人崇拜,相信白猫黑猫,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他的“政绩”绝术团的确帮残疾人赚了人民币。想买列宁遗体,要不是选错政治符号,如果修个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兴当地经济。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官员——《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做过国民党保安团长,小说结尾又做新社会的县长,他将来会不会有政绩呢?还有阎连科新作《炸裂志》里的领导,以及余华《兄弟》里的李光头,即使不是官员,也很有权势。明明是个坏人,怎么居然也可能做好事呢?这又是一个严峻的问号。

在以上五种干部类型中,以第三和第四种最有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系列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第三种“好心办坏事”,是农民对官场的基本想象,第四种“好干部爱读书”,代表知识分子对官员的美好期待。

## 二、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黎翔凤 400)士农工商也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里人物形象重要性的一般秩序。知识分子一直是主角,一来作家身份就是知识分子,是创作主体;二来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知识分子。20 世纪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呐喊与彷徨的交替——晚清是呐喊,五四是彷徨,50 年代又呐喊,80 年代又彷徨。

百年来,晚清时期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或叙事者)最勇敢也最有信心,或为“国师”顶层设计(《新中国未来记》),或在租界(局外)毫无顾忌地批判清朝(《官场现形记》)。作家与主人公心态高度重合,感时忧国救世救人。梁启超不仅

首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还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新小说》1902年11月14日第一年第一号)。从黄克强、李去病开始,20世纪小说中很多知识分子主角,都有指点江山指导官场的使命感。李伯元在小说结尾说他批判官场的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书生主角“九死一生”,也说要跟各种肮脏“怪现状”作斗争(实际上有很多妥协)。《孽海花》的主人公原型是同治七年状元,官至内阁学士;老残更是晚清知识分子文侠形象的典型代表:虽有高官赏识提拔,依然坚持街头行医,路见不平,看见官府执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侠客一样仗义执言(当然身上带着“尚方”信件)。

晚清小说中文人主角的政治能量被他们自己高估了,而晚清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却被后人低估了。五四和晚清的关系,现在学界颇有争论。仅就白话文和感时忧国而言,五四作家与梁启超、刘鹗基本一致。关键的不同在于,晚清小说家从感时忧国出发,写出了救国家救百姓的黄克强,写出了批判怪现状的“九死一生”和侠客老残;鲁迅等人也从感时忧国出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独的人。

五四主流作家比起晚清报人小说家(梁启超除外),实际社会地位其实更“高”一些,作品影响也更大,但是他们笔下的读书人形象,却更“弱”,且充满矛盾——“狂人”是个精神病患者,大声疾呼反礼教,自己却去候补做官;魏连殳能够流泪长嚎“象一匹受伤的狼”(鲁迅,第二卷90),但也要苟且担任将军的秘书官;《沉沦》男主角躲在妓寨写爱国诗;冰心的超人既相信尼采又相信小花;莎菲既喜欢男色又追求革命;“财主底儿女们”只能“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路翎13)……总之,现代文学里的知识分子,既想唤醒农民也要改造官场,又怀疑、悲观、动摇。怀疑无力唤醒农民,悲观也无法改变官场,两面作战,好像均无胜利希望,于是只好彷徨困惑。民国小说家写知识分子,基本上就三个类型——病者、弱者、孤独者。

到了5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又成了勇敢的战斗型人物。很多主角不仅在心态上,而且真的身兼干部身份(如许云峰、江姐、贾湘农、少剑波),或者选择干部做爱人(林道静、卢嘉川、江华)。读书人如果不做干部,其他选择就很有限,不是甫志高就是余永泽,都是反派。主人公的处境是危险的,甚至要牺牲生命;作家的写作策略却是安全的,集体创作,广受欢迎。在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三红一创”的作者们,先当干部再做作家。当时知识分子普遍要接受的“洗澡”等改造过程,则要滞后大约二三十年才进入小说。

8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8年)以后,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再次变得比较复杂——也还有勇敢侠气,最多是彷徨苦闷,以及各种怀疑超脱。张承志《金牧场》的抒情男主角如侠客般抵抗投降,梁晓声、韩少功笔下的知青也坚守理想。抒情主流是苦难历程中的彷徨苦闷——《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像在重复郁达夫式的情欲/思想苦闷(不同在于郁达夫想“启蒙”女工,张贤亮则是被农民“救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史的一个缩影)。在另一些作家那里,技巧实验伴随着种种怀疑:残雪《山上的小屋》怀疑家庭,马原《错误》怀疑江湖,王朔《动物凶猛》、王小波《黄金时代》怀疑究竟什么是“流氓”……也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无聊如《废都》中的庄之蝶……

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后的反差尤其值得注意。之前国家不幸,小说人物像英雄、如侠客;之后革命来临,知识分子主人公不是疯狂、忧郁,就是孤独。究其原因,一来是科举被废,士无法“仕”,断了读书人传统救世之路。二来因为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心理,外表看着像侠客英雄,内心恐怕也是孤独彷徨。三是五四文人觉得拯救中国,“国民性”比“官场”更重要——既是文化上的悲观设想,也是政治上的天真期望。

疯狂、忧郁、孤独,这三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类型,早就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代表人物分别是狂人、孔乙己、魏连殳。这三种知识分子形象,后来也贯穿了中国小说100年。

虽然鲁迅自己很悲观,他最后让狂人重新做官,但是至少狂人在“病中”的清醒、勇气、战斗精神,引导了20世纪不止一代的知识分子。觉慧、林震、蒋纯祖,还有还没被冰心感化的“超人”,

《古船》中的抱朴,《金牧场》里的“人民之子”,甚至《白鹿原》里面对各种军阀政党都毫无惧色的白鹿书院的朱先生……这些人物天真、勇敢、执着,像狂人一样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们都是努力在黑屋子里开窗的战士,也不管开了窗以后能不能开得了门,也不管屋子里的人是真睡还是装睡,或者会不会责怪他们。甚至许云峰、江姐他们也是这种救世传统,也有狂人的遗传。

这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狂人”,中国的堂吉诃德。

第二类读书人从孔乙己开始,明明社会处境很惨,精神上却还残留着儒家教育的优越感。吃饭喝酒都没钱了,腿也被人打瘸了,还洋洋得意地教旁人“茴”字的四种写法。如果孔乙己也有机会用第一人称抒情,他其实也像郁达夫笔下“袋中无钱心头多恨”的多余人,基本特点就是身体已在社会底层,心里仍想着五洲四海。这种零余者形象令早期的沈从文很有共鸣<sup>④</sup>。50 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又有大量机会在底层“洗澡”或劳改,可以有意无意保留“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基因。生态心态形成巨大反差,一直发展到人们今天说的“地命海心”。劳改犯章永璘饥饿中读《资本论》,最后还到大会堂去感谢绿化树。知青们年纪轻轻葬身沼泽地,坚持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秦书田低声下气刷标语,要求从“右派”改为坏分子。孙少平和其他搬运工的不同,在于他在工地点油灯读西方小说。王蒙在 80 年代回首审父,发现倪吾诚其实也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于乱世,没法修身,更难齐家,被家中女人泼了一身绿豆汤,仍念念不忘欧洲的种种先进文明。总之,后来无论“右派”平反或知青下乡,其共通点都是生态心态的强烈反差形成反讽,“身处低贱心比天高”成为 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一个宝贵传统。

“五四”文学有“狂人”和“多余人”,80 年代后,小说中出现了“狂人”与“多余人”之混合,就是身处社会底层,仍做思想先锋的人物形象。地主儿子苦读《共产党宣言》,劳改犯枕着《资本论》睡觉,金牧场草原培养“人民之子”,这些符号后面,是安全策略操作,但也有真的传统和信仰。

“孤独者”是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三个类型。这些人也感时忧国,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坚定。他们的社会处境也不如意,但没有

孔乙己们那么悲惨。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在一般民众之上,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内心痛苦、忧郁、矛盾、彷徨、孤独。在“狂人”战士看来,他们的忧郁多少有点自作自受;在普罗大众看来,他们的烦恼又有点矫情,自作多情;但是在这类知识分子自己心里,心理危机就是一切,是最真实的世界。有时这种孤独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怀疑自己对礼教的态度,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受做官也很痛苦。有时这种孤独连着身体,灵肉冲突,性苦闷,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鸣,比如《沉沦》。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无力、追求爱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启下”的觉新——既承受上一代重托,又理解弟妹的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经济人生,可以专职追求爱情,但还是孤独苦闷的莎菲女士等等。

这类忧国忧民无力、社会地位小康、内心好像特别痛苦的孤独者形象,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到 40 年代。50 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被编入不同级别的干部队伍,要么像林震般革命,要么学韩常新“上进”,“多余”“孤独”都是奢侈品了。

除了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孔乙己、孤独者等三种知识分子类型以外,还有第四种,鲁迅没有写,钱钟书等人补上。这种读书人形象缺乏忧国忧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在社会生存中只能作些无奈的选择和挣扎,虽然于事无补,却也于世无损。比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里的医生,《梅雨之夕》中为陌生女子撑伞的上海男人,还有无用才子方鸿渐,缺乏忧国忧民传统、不会救人也不要人来救的一个知识分子。90 年代模拟颓废的庄之蝶,以性爱作精神武器的王二,某种意义上也是方鸿渐的传人,也是拒绝救人和谢绝被救的“消极自由”的追求者。

简单概括,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晚清是侠客救世,五四时是彷徨孤独,50 年代是英雄为民(很少多余人),80 年代后主流是“地命海心”,有人坚持抵抗投降,有人追求消极自由。

### 三、20 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农民形象当然贯穿于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各个阶段,而且有一个被欺压——被欺亦欺人——翻身/分化——很苦很善良的变化过程。《官场现形记》里农民、丫鬟、仆人等都是被迫害者,《老

《残游记》里“民众”定义宽泛,有雇工、妓女,也包括地主,并非特指耕地的农户。所以吴福辉认为:“只是到了‘五四’,[……]文学才发现了农民。”(吴福辉 174)虽然在他看来,五四知识分子观察、审视农村农民的立场态度,“和晚清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截然不同”(14),但在小说里,农民还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势群体,从麻木的闰土,到卖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补品》中的农民夫妇,从《生死场》里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妇女,到沈从文笔下将妻子送出来卖笑的农民丈夫……还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主要都强调农民苦境。最大的不同是五四也有作品写农民不仅被欺而且欺人,《阿Q正传》既代表又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农民文学。

《小二黑结婚》以后,农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两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进和落后。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一直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民都被划分成先进和落后。男主角如梁生宝、萧长春常常兼任基层干部。小说中的中间人物,如二诸葛、郭世富、梁三老汉等,是比较成功的文学形象——因为“落后”的内涵比“先进”丰富,包括“迷信”等知识及信仰系统,包括宗族祠堂文化的残余,包括“红牛黄牛能够耕地就是好牛”的农民哲学……

到了70年代末,农民在小说里又从幸福翻身主体变回受欺负的苦难群体。在高晓声、茹志鹃笔下,麻木善良的农民辛苦劳作几十年,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或者“十年”等多次社会危机,承受了最实实在在的损失。李顺大、陈奂生,流着阿Q的血,延续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尽小算盘,还是糊里糊涂在底层“幸福”挣扎。这些农民的命运与“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可以象征50年代官民关系的基调和主流。这种关系偶然也有不和谐,如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农民抢粮。《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农民做小生意都会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芙蓉镇》里卖豆腐发财,要变成“新富农”。《活着》的主角是地主儿子,小说中却有太多感人的细节。“很苦很善良”,原是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概括,可是善良的中国读者,看着看着也就忘了阶级斗争这条弦,认同福贵似乎就代表了几十年中国

农民的典型命运。

只有极少数作品,不仅写农民很苦很善良,也写他们很坏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儿子黑娃,分别代表农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残酷。《受活》中的农民,残疾人被人欺,圆全人也欺人。貌似又回到了鲁迅一早分析过的农民的两重性。

官场与农民的“矛盾依存”关系,也有历史演变过程。晚清小说是官场压迫农民及地主;“五四”后官府主要压迫贫农,地主是帮凶。但农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后,农民分成先进和落后,官员也是黑白分明。好官拯救人民,不听从好官,便不属于“人民”范围——官民关系,有一个互相证明的逻辑关系。80年代农民回首往事,虽然被人欺负,但官员大多数还是好人,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办了坏事。农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终究是好官,所以也就原谅了。诉苦是和谐社会的安全阀门(《活着》持久畅销),但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农民与官场,是矛盾依存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农民,则是“启蒙救亡”的关系。晚清五四,知识分子想启蒙民众;50年代知识分子身处底层,接受再教育,但其实不是农民让他们在底层,农民反而真的在“救亡”——救章永璘等人于生存底线。到了80年代,知识分子又再启蒙大众。小说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复杂性,黄子平等学者已经分析过,有“灵魂的沟通”(国民性无处不在?还是沈从文理解柏子,萧红描写王婆卖马?),有“灵魂的震醒”(开始是读书人想唤醒昏睡的大众,后来要倒过来,农民用白面馍馍等震醒知识分子的灵魂,再后来有了“装睡”一说,人们已不知谁应该震醒谁的灵魂或肉体,或者究竟什么是“睡”,怎样是“醒”),也有“灵魂的高大与渺小”(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 7)(从《一件小事》开始的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崇拜),还有“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知青-农民的最佳同框文本是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四、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和商人形象

比起“士”和“农”,20世纪中国小说中著名的工人形象确实较少。有现代文学史评论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唐弢 230),20年代中期,郁达夫一边

描写青楼文化抒发性苦闷,一边积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他的《薄奠》也写了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虽然不是严格的产业工人,但显然也不是农民或者职员。

如此分类,祥子就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工人形象,特别是在自己的生产资料早早被兵痞抢走以后。和烟厂女工诅咒自己从事的烟厂不一样,祥子把人生希望建筑在自己工作上。另外,《子夜》里也有一些工人群像,罢工斗争当中有大公无私的,有投机叛变的,有贪图私利的。《淮南子·齐俗训》里说:士农工商,“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610)。所谓“言巧”,指的是工艺、技术。从这个角度看,写工人的文学,真是老舍最实在——只有祥子,曾经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工艺技术、他的生产工具,还有他的职业道德。

到“十七年文学”里,工人阶级名正言顺地成了领导阶级,但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以工人为主角的仍然很少。有意思的现象是,“红色经典”里的主人公自己是干部或者农民,是职业革命者,可是他们都被安排有一个不用出场的产业工人父亲。《红旗谱》里,领导农运的教师贾湘农,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工人;《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江华,还有《红岩》里的许云峰,他们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许云峰还是工委书记,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钳工。总体上,这些工人身份标志,符号意义大过文学内容。

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重放的鲜花”里林震要下工厂调查,改革文学中的乔厂长也要抓工业生产,《平凡的世界》有工地搬砖、煤矿工下井等等,但这些小说要么写的是工厂,不是工人;要么主题还是农民“进城”,是农民变成工人。

为什么在近百年中国小说里,相比之下,士农工商中的工人形象比较单薄?甚至在“十年”期间,大批判都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怎么就没有描写无产阶级同时也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朝霞》的工人创作比例高了,文学意义恐怕仍然存疑。这也值得研究者思考,尤其是据说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民了,人民的主要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小说的三大主角是知识分子、农民和官员,相对来说,工人和商人是“弱势群体”——不

是剧情里的弱势,而是较少有机会成为小说主人公。如果还要再比较,商人其实比工人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

“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当中,读者记得住的工人主角,不分男女,实在很少。以后须多些阅读,再作研究。反过来,讲起商人,人们马上想起吴荪甫、赵伯韬、“财主底儿女们”、还有《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等等(大部分就靠茅盾一个人在写)。现当代文学怎么写商人,倒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题目。

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商与商言数”。晚清小说里的官员来往,议政少,言数多。他们并不关心国事,整天讨价还价:这个官位,任期多少年,值多少银子;上面来了巡视组,下面交多少钱,要交的太多,宁可坐牢去……官场有不少生意。

许地山写过《商人妇》,主要是写妇人命运,很少言及“商”。全面剖析商家历史处境,还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的茅盾。《子夜》中的商人群像,简单说有四类:一是赵伯韬买办;二是吴荪甫民族实业家;三是在这两者之间投机,既想办实业又想多赚钱的杜竹斋;第四类最惨,就是像冯云卿这种在乡下的土财主,进城经商,到处失败,最后用女儿做工具骗情报,白白赔了千金和白银。晚清小说里的人伦堕落,到了茅盾笔下变成商人沉沦的标志。人们一方面佩服茅盾作为小说家对于都市商界各色人物的观察兴趣,另一方面也可惜茅盾的商人分类有时候太迁就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在更多激情、更少理论的路翎笔下,商人蒋捷三和他的后代是比较难以定性、也比较复杂的商人形象。严格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也大都可算商人。乔琪乔和季泽是花心、没有出息的商人。范柳原虽然跳交谊舞,背诗经,恋爱的基础还是有钱帮女主角订头等舱船票和浅水湾海景房。之后情人一到手,马上又要坐船去英国做生意,尽显商人本色。最有意思的是佟振保,他的商人性格并没有表现在他怎么开厂、如何办实业上,而是一发现老婆出轨,气昏了头出门,居然没讲价就上了黄包车。能让一个商人气到忘了讲价的地步,该是多么令人激动、愤怒的事情。

50年代以后,“三红一创”里很少有商人形象。刘思扬作为革命者,出生于有钱的家庭,但那只是背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有同学贪图物质,下嫁权贵。总体上前30年,公私合营,商人

也不见了。

80年代,张炜《古船》里老隋家的两个儿子抱朴和见素,可以视为新时代商人形象的代表,而且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弟弟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反抗他的家族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历史遭遇。所以,他拼命要抢夺家族粉丝企业,要争着承包,也要到城里去投机打拼。当然,张炜把他写成失败者。出身更低且性格比较类似的,还有《兄弟》里的李光头,在余华笔下,他非常无耻地在新时代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哥哥抱朴,张炜把他写成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同时又苦苦研读《共产党宣言》的人。所以,最后他发展了商业,复兴了家族,还拯救了父老乡亲。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商人形象。放在20世纪文学背景中,《古船》颇有野心地虚构想象了中国式新时期资本主义的两种发展可能。

80年代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就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电视剧里,有更多晋商的传统、大宅门的历史、胡雪岩的传奇等等。总之,有钱人也要有光荣历史。在全面回顾民国史的《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是财主,是地方上的“族权”和“政权”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善于讲数的商人。买卖土地、销售鸦片、创办学堂、建造白塔,有意无意地还培养书记、县长等家族接班人兼政治代理人。历史的经验表明,做生意首先要做官——晚清作家早就告诉各位了。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形象,正好补充了“三红”系列当中有钱人形象的历史缺失。补得是否合适,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商人形象不多,但90年代前后中国、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一些长篇小说,如《白鹿原》《活着》《古船》《生死疲劳》等,主人公却都是“财主底儿女们”,似乎不是偶然现象。

综上所述,倘若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只是知识分子和农民,那么“启蒙救亡”关系便是最重要的文学主题。但是从晚清开始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不难看到官员/干部形象显然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梳理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之间“互相改造”的历史过程,同时探讨小说中农民命运与官员/官场的矛盾依存关系。

“互相改造”有个过程,晚清小说中知识分子

想改造官场、教育官员;“五四”主人公退一步,视仕途为堕落;50年代是革命改造作家(主角干部化);80年代后小说家对知识分子和官场的关系有更多元的想象:或者回顾苦难历程,身处底层,心中仍然充满政治使命感;或者寄希望于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或者寻求不同的脱离政治的方法,下棋、做爱、受戒等等。

“矛盾依存”关系也有复杂的演变。晚清是直接对立,官府压迫农民;“五四”还是官压民苦,但官员不是焦点,主要写帮凶爪牙;延安以后官场/干部分化,或是敌人或是救星;80年代再回首,发现还有官员欺负农民,但是“好心办坏事”,有时甚至“坏官”也可能为农民谋幸福。

从文学性而言,官员形象总体上并不如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那么有成就,并没有产生阿Q、祥子、七巧、方鸿渐或者章永璘、白嘉轩、福贵那样的典型人物(虽然也有华威先生、刘世吾或江雪琴)。但是在晚清和当代,小说中如果没有官员形象存在,中国故事便无法讲述。

本来是两种人物形象系列合成一个主题线索,现在要考察三种人物形象系列,同时出现至少三条主题线索,多了很多变数,于是,小说里的中国故事更加复杂了。

#### 注释[Notes]

① 顾颉刚《〈官场现形记〉之作者》一文记载:“《现形记》一书流行其广,慈禧太后索问是书,按名调查,官交有因以获咎者,致是书名大震,销路大广。”参见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② 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发表文章《人生问题发端》,主张:“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所有我们可以知、应当知、以为要紧,应当以为要紧的,都是和人生有关,或者是人生的需要。”可参考周展安:《现实的凸显及其理念化——对“五四运动”思想与文学内在构造的再思考》,《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论文集2019》。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20—43页。

③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同年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了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的问题。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3(1999):123—139。

④ “生活的卑微,在这卑微生活里所发生的感触欲望上进取,失败后的追悔,[……]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参见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册),陈子善,王自立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页。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5(1985):3—14。

[Huang, Ziping, Chen Pingyuan, and Qian Liqun.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5 (1985): 3-14.]

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Li, Xiangfeng. *Annotated Guanzi*. Vol. 1. Ed. Liang Yu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11月14日第一年第一号。

[Liang, Qich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New Fiction* 16 November 1902.]

《淮南子·齐俗训》,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Liu, An, et al. “Placing Customs on a Par.” *Writings of Huainan Masters*. Ed. Chen Guang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Lu, Ling. *The Children of Moneybag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Tang, Tao.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Wu, Fuhui.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责任编辑:王嘉军)

